

寻找巴金

坂井洋史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寻找巴金

坂井洋史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巴金 / (日) 坂井洋史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11-4980-1

I. ①寻… II. ①坂… III. ①巴金 (1904-2005) —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0174号

XUNZHAO BAJIN

寻找巴金

坂井洋史 著

策 划 周立民 陈 武

责任编辑 燕啸波

责任校对 汪 平

装帧设计 孙豫苏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 × 205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980-1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动摇的虚实 / 叙事, 或者“文学性”的源泉 …	001
——在沙多 - 吉里 Château-Thierry 思考的事	
围绕巴金的重新评价……………	021
——何谓“文学性阅读”?	
“心”的寓言 / 理想的悖论 ……………	035
——围绕林憾庐《无“心”的悲哀》、王鲁彦《灯》 和巴金《我的心》的感想	
《随想录》的叙述策略和魅力……………	048
关于 Gracie Fields 所唱 <i>Sonny Boy</i> (宝贝 儿子) 及其他……………	081
关于斯托姆原著、巴金译《在厅子里》……………	104

关于日本最早的巴金作品的翻译及介绍·····	110
------------------------	-----

【附录】饭田吉郎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文献目录（增补版）》所录有关

巴金文献一览·····	117
-------------	-----

杂考两则·····	119
-----------	-----

——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巴金的世界——两个日本人论巴金》后记·····	163
--------------------------	-----

《巴金论集》后记·····	175
---------------	-----

后 记·····	184
----------	-----

动摇的虚实 / 叙事，或者 “文学性”的源泉^①

——在沙多 - 吉里 Château-Thierry 思考的事

思考的前提

我们“研究巴金”、研究“被公认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对象 / 领域的（巴金）”，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其意义何在？面对如此发问，我猜想，今天大多数文学研究者会觉得它太幼稚、不值一顾，不承认其有认真思考的必要。不，与其说不承认，更不如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其实，对于这种“幼稚”的问题，能够回答出明

^① 本篇以“第十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2014年11月22至23日）的提交论文为基础，对此补充两次而成。2014年12月27日补充版刊载于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点滴》2016年第2期（2016年5月）上。后来，读了《点滴》版的贺宏亮先生为文补充拙文之不足，因此本书版本追加了一条“补注”，注明贺先生的贡献。

确答案的“研究者”究竟有几何？大凡所谓学术研究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外是以下几项：丰富的材料、缜密的思维、犀利的分析、新颖的结论。看来学术研究也走在线性进化论的轨道上：今天的学术研究应该胜于昨天，明天的研究更要胜于今天，后来者一定要居上，超越前人而实现非我莫属的创新性。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原则，我也深表同意。然而一味追求“进化”之余，如果对于上述“幼稚”的问题回答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或者避而不谈，那么如此“进化”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之“进化”，我还是未免有点怀疑。因为“幼稚”的直觉或感性的预感往往会通向事物的最本质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幼稚”的摒弃也许导致对于“本质”的漠视。

对于某一个作家的生涯和思想、某一部作品文本的审美价值、作家走过来的时代和社会及其文化背景等等进行“研究”，偶有新的发现或观点，就写成论文刊于学术刊物上。经过长年的辛苦经营，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就撰写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公之于众。有时研究者集于一堂而交流各自的成果，互相切磋学问……如此“研究”的“形式”已成为不容置疑的学术常识而体制化，是今天学界中人士习以为常的“规矩”。但如此“学术研究”原来是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此一框架内进行的制度化“研究”，与19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工程密不可分。由于其本质上的前提/局限，它无法超越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也

无法将现代性的“价值”和国家的存在相对化。就是说, 如此学术研究是有保留的意识形态运作, 而它的完善, 就为国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服务。

据近年来初步观察和思考, 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朴素的判断: 在今天所谓“文学研究”中(或者说, 在研究者有关“研究”的观念中), “文学”和“非文学”纠缠在一起, 起到某种融合/互相渗透的作用; 何谓“文学”本身? 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根据或属性为何物? 以一言蔽之, “文学性”是什么? 等等本质性问题, 似乎未被予以深入的思考而搁置在一边, 动辄被说成“幼稚”或者“过时”。当下大部分“文学研究”无条件地接受既定的制度化框架和形式, 对于上述本质性问题不闻不问, 一味追求“研究”的精密化。结果, 文学文本竟然变为“资料”, 往往成为其他学科诸如历史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等“掠取”“侵占”的对象, 而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愈趋贫瘠。关于这一点, 我们一想起所谓新历史主义批评所持观点和方法论就不难理解。在它的视域中, “文学”再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存在, 而是某一个时代某种类型的社会下层建筑产生出来的生产物(products), 也是流通在市场上被交易的商品。经过如此一番物化, 文学就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可以肆意分析的对象了。想到“分析”一词的原义(即“分开”而“剖析”), 我觉得这个事体实在意味深长: 文学

经过“非文学”的“分”和“析”竟被七零八散地片断化，丧失其整体性。相对于此，我希望能够在“非文学”终于不能掠取、侵占的要素当中看出只有文学才具备的某种“质”来。这个“质”，换句话说，是文学性的根据和源泉，也是“非文学”代替不了的，文学研究要追求的最终目标。

关于“非文学”，我想在此顺便补充一下。说到“非文学”，尤其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所谓政治意识形态。所谓“政治与文学”此一命题是指：文学有文学固有的追求和目标，是一个自律自足的存在；政治是非人性的机器或机制，永远屹立在文学的对立面而否定文学的自律性和自足性，强制文学服从于政治宣传，以强权高压的手段扼杀文学……谁也不能否认，作为历史上的事实，如此情况曾经确实发生过。的确，“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很大，两者各自都有无法替换各自的独特表现和作用。但是，作为人类思维的能动力量之高度/集中表现，政治与文学的分野是否真的那么截然不相容？我未免怀疑。且不问政治能否成为审美鉴赏的对象，今天我们不是基本上一致承认构造“文学”的种种话语本身是权力的表象，而话语的建构、散布、普及以至固定的所有过程都离不开广义的“政治”（politics）吗？至少，如果我们一直囿于“政治与文学”式古典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那么对于“文学”的界定和理解也就跳不出“文学是以审美为主要属性的、具有独

立价值的语言艺术”一类教科书式通俗共识。^①

鉴于此一缺憾, 我在此思考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根据或文学性的源泉之际, 想换一个角度, 引进另外一组概念, 即可视性 (visibility) / 不可视性 (invisibility)。

① 关于这个问题, 我曾经在《武田泰淳·主体性·公共空间》(谭仁岸译,《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卷第6期, 2013年12月)中说及21世纪初所谓“竹内好热”的部分探讨过。该文中我注目于20世纪8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而形成知识结构的一代知识分子思维模式中存在着“缺席 / 盲视”及其克服的过程, 指出过:

……在80年代“一边倒”的文化状况中, 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本来就存在着空白, 而体验了“90年代的反讽”之后, 他们渐渐开始意识到这种空白乃是悖论性地制约自己的要素……从而把其视为“政治的‘缺席 / 盲视’”, 把其重新焦点化, 做出了试图克服的努力……/ 这种认识转换, 当然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学观上。例如, 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再采取一方压迫或隶属另一方的形式, 而是有机统一起来(70年代以前是前者压迫后者, 80年代是后者规避对前者的从属。但两者都依据着“政治”与“文学”这两种价值相互“矛盾对立”、绝对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 / 选择”的思维方式), 不再像80年代那样把文学特权化, 但依然认为文学是现实批判的有力手段, 试图重新赋予其生命力……在这种新文学观的摸索过程中, 竹内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回归”主题的支持下, 迅速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因为, 竹内好描绘的存在主义式的鲁迅, 恰是主动拥抱虚无, 以现实世界中绝望的“挣扎”为媒介, 辩证统一了“政治(革命)”与“文学(启蒙)”这对(一般被认为是)无法相容的绝对矛盾。在我看来, 以上便大致是“竹内热潮”发生的原因。

发表该文之前, 我还在《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第一章《关于19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现代论”和文学史研究的设想》中也作过同样的观察和分析。

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文本原来是一个场域，是一个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而我们读者从中读取许多丰富的东西来。读者本来享有这个权利。换句话说，我们把埋藏在文本内部的种种因素发掘 / 暴露出来，即把它“可视化”而认识、理解、欣赏、评估它。但是，如此发掘和暴露之余，在文学作品中依然存留着毕竟不能完全可视化的不可视性因素，诸如现实的作家、附于文本的标签即“著者”的署名、文本中的主人公，或是小说的叙述主体之间的认同关系、小说在情节和故事中有所反映和试图再现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性问题、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非逻辑关系等等。要之，是“虚实”的不确定性问题。虽然读者有自由解读文本的权利，但是偏偏缺乏最后确定虚实的权利。对于他们来说，虚实的真相究竟是不可视的。

无法确定虚实的边界性因素，当然不能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等“非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些学科仅仅研究被公认为确实存在的可视性东西。与此迥然不同，文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阔，其研究对象是包括不可视性因素都在内的整体，即世界的万象。我认为，不将这一点放在思考之中心位置的所谓“文学研究”，虽然自以为取向于学术研究的精密化和科学化而为此一目标做出贡献，实际上，在作为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学术研究”格局中，也势必被迫放逐到边缘地带而愈趋丧失本

该拥有的功能和作用。

关于为容《Château-Thierry 通信》

那么, 如上所说虚实、真实性、文本中的现实之反映和再现等研究主题, 亦即可以从可视性、不可视性概念切入的研究主题在巴金研究领域中能否成立? 可以成立的话, 应该如何进行思考、展开研究? 以下我想提出小小的例案, 作为思考的一个开端。

2014 年早春我有机会访问巴金曾经留学的法国, 趁此难得的机会, 专程到巴金逗留一年多的巴黎东部小城沙多-吉里 Château-Thierry (以下简称“沙城”), 浏览市容, 也去参观巴金曾经念过书的拉·封丹公学 Collège Jean de la Fontaine 等地方^①。当时我手里持着当导游书看的, 不是巴金以留法期间的见闻为主要材料而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复仇》所收诸篇^②或记录 1979 年春天再访沙城时活动和感受的《随想录》中一篇《沙多-吉里》^③, 而

① 本文中沙城的图片除了图 7 外均系笔者 2014 年 3 月 9 日所摄。

② 《复仇》, 新中国书局 1931 年 8 月初版。现收在《巴金全集》第 9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集中诸篇如《洛伯尔先生》《丁香花下》《墓园》《父与女》《狮子》《老年》等均以沙城为舞台。

③ 《沙多-吉里》, 最初连载于 1979 年 7 月 25、26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后收《随想录》第一集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79 年 12 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6 月), 后收《巴金全集》第 16 卷 (1991 年)。

金之间关系的也似乎没有出现过。

作者“为容”何许人? 如果相信小说所记都属实或在相当的程度上忠实地反映“事实”(自然这里就来了一个极为棘手的上述“虚实”问题, 但是暂且不管它), 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主体即主人公姓“赵”, 那么作者姓名就是“赵为容”了(再说, 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而在篇中一个地方“我”叫自己为“为容”, 与作为文本的 paratext 的作者署名一致)。小说采用书信体体裁, 全文就是写给“武大”的老同学“鲁星”的“书信”; 还有一处, “我”把房东比拟为“我们海州北门街开杂货店的张老头儿”, 那么“赵为容”是海州人吗? 文本之外的信息更缺乏, 寥寥无几。后来有一同姓同名人物撰写过两出独幕“教育戏剧”, 还编过一本《民众图书馆设施法》^①, 除此之外, 我至今没有抓到任何线索^②。

小说中关于沙城种种情况诸如地理、地形和地名的描述极其具体且详细, 除非身临其境的人绝对写不出来。作者来 / 住过沙城, 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主人公“我

① 两出独幕剧是《爱力》和《船上一童子》。均为“教育戏剧小丛书”版, 1934年9月由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刊行。《民众图书馆设施法》, 1932年由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部刊行。

② (2016年7月补注) 贺宏亮《关于“为容”和“鲁星”的考证》(《点滴》2016年第4期, 2016年8月)是篇关于“为容”其人其事极其周到的考据, 应为目前关于为容(赵波隐, 1901—1969)的最详细的介绍, 可参看。

(为容)”来到沙城之前的经历，小说中借主人公的口有所说明：

她又问：“你到法国几年了？”我说：“刚刚十三个月。”她又问：“未到此地以前你在那儿？”我说：“从马赛到蒙伯里野 (Montpellier)，最初两个月在 The berlitz 学文法，马逸谷 (M.Manièval) 律师替我改作文，更结识了一些住在 Villa Florida 的农业学堂的校外生。九个月后便到了巴黎。在巴黎没做什么正经事，无非是听戏，跳舞，下咖啡馆。为避开这嘈杂的生活，才到 Château-Thierry 来。”

再看小说的开头部分，有一段说明：

去年十一月十五我到 Château-Thierry 来，听说这儿有个公学名 College Jean de la Fontaine 的，每月只须缴一百九十佛郎，因为我的钱借给朋友回国去了，我便想借此权当做个便宜的客栈。

“十一月十五”是 1927 年 11 月 15 日。小说末尾记有日期：一九二八，一月，十二日。如此就可以知道，小说

记的是 1927 年 11 月中旬至 1928 年 1 月中旬短短两月的事情。巴金于 1927 年夏天离开巴黎闹市移到沙城, 一直住到翌年 8 月下旬。我们可以知道这篇小说的故事是巴金在沙城的期间展开的。

今天我们都知道巴金在拉·封丹公学念书期间有过两位好友, 一为桂丹华 (安徽桐城人, 1901—1958), 一为詹剑峰 (江西婺源人, 1902—1982)。《Château-Thierry 通信》中出现有姓无名的四个中国留学生 (均为配角): 章君、桂君、李君和刘君。“桂”在中国似为生僻姓, 小说中的“桂君”有可能以桂丹华其人为模特儿。至于“李君”是否巴金 (李尧棠), 那就不能臆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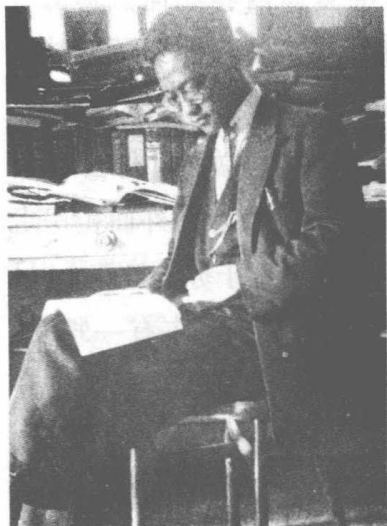


图 2 1928 年巴金在 Collège Jean de la Fontaine (拉·封丹公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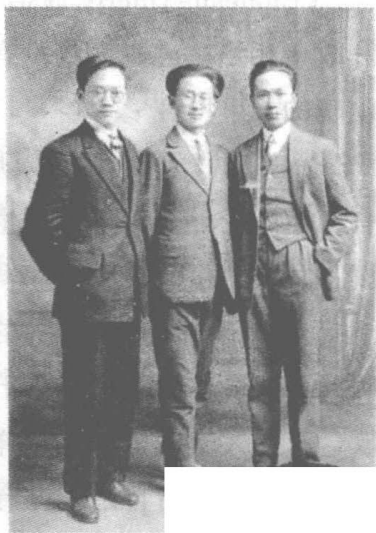


图 3 1928 年巴金、桂丹华、詹剑峰在沙城 (左起)



图4 拉·封丹公学旧址（现让·拉辛公学 Collège Jean Racine）

《Château-Thierry 通信》的具体内容如何？其情节和故事相当单纯，简直没有什么复杂的文本结构或惊心动魄的故事可言：

——“我”到了沙城后，先住进拉·封丹公学宿舍，但由于环境的恶劣而生病，因此决意在外面租房走读。后来他和朋友“安徽章君”合租位于苏也松路84号（84, Avenue de Soissons）的舒适房间。房东有一甥女，叫 Lucienne Riffard，是二十一岁的漂亮姑娘。她性格开朗，与男人交往也肆无忌惮，对待“我”很亲密。“我”以为 Lucienne 对自己很在意，可以做异域情人，处处表示爱慕之情，献殷勤。事与愿违，Lucienne 已有亲密男友，而且不久竟然跟他订婚，致使“我”失恋伤心。与